

书

友

蒋星煜

文坛艺林见知录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文

丛

友

蒋星煜

文坛艺林见知录

倪墨炎 主编

书

丛

文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 新登字118号

责任编辑 阮智富

装帧设计 陶雪华

文坛艺林见知录

蒋星煜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200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18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432-0254-9 / I·52

定价: 14.50元

总 序

我们深信：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读书可以怡然自娱。

因此，我们愿意提倡读书，愿意在书界打杂，愿意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现代生活节奏的日益加紧，使人们更关心休闲的生活，要求提高休闲的质量。休闲本来是各有所爱、各得其所的事。看电影，守荧屏，兜马路，逛商场，上公园，走亲戚，几个朋友围打扑克，三五知己相聚喝茶，黑白子斗智，保龄球强身，都无所不可。当然，也可以在卧室兼书房的斗室里，或在小小的亭子间辟成的书斋里，坐拥书城，自得其乐。如能邀集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书斋里高谈阔论，交流阅读见解，更是高雅而赏心的乐事。

在休闲的时间里，人们大都喜欢读短小的文字，这或许是近年小品散文走俏的原因之一。读书随笔是小品散文的一种，是一种较自由的文体，可容的内容也比较广阔。它可以写人书事，可以侧重写人，可以侧重写事，也可以侧重写书；它可以是读书札记，诸如史料考证，版本书话，钩沉辑佚，掌故琐记，乃至一段古文的释义，一条注文的纠错，一篇膺品的辨伪，都无所不可；它也可以是读书随想，可以接近于书评，也可以接近于鉴赏，也可以接近于创作谈，乃至接近社会文化现象的短论。至于写作谋篇，更无拘束，既可以是文章，也可以是日记、书信、访谈记录；既

可以笔致凝重,也可以下笔轻松,既可以生动活泼,也可以严肃老到;既可以絮絮如谈家常,也可机智而妙语连珠。

我们不大赞成把读书分成求知和求趣两类,好像一种是为“致用”而读书,一种是为“趣味”而读书。其实,在读书生活中,常常是求知中得趣,自娱中得识,两者总是相辅相成,不大可能分离而对立。我们也不赞成指定某种书“你一定要读”,如有异议,就唠唠叨叨地讥笑人家不懂“书趣”。其实,真正该被讥笑的是谁呢?读书本来就是见仁见智、各行其道的事,何必强人所不愿?人家爱吃蹄膀,你非让人吃排骨,岂非傻事!

本丛书所辑内容广阔甚或驳杂,写法多样且各有风格,但各书也有共性,那就都是读书随笔或准读书随笔。我们相信:它们会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我们——参与编辑、出版本丛书的同志们,是爱书的一群。我们愿意以书会友,以书为友。我们愿意为书的事业竭尽绵力!

主 编

1996年夏于沪西

自序

这个集子收五十四篇短文,都是近十年(1986-1996)来所写,记述了陈望道、胡适等文学家,周信芳、俞振飞等戏剧家,程十发、戴敦邦等美术家,其中菡子、傅全香等几位是女性。因而本书就名之为《文坛艺林见知录》。

我并没有为他们写传记,而是以写我和他们的交往为主,全是多年来生活中一鳞半爪的回忆,而不是采访所得或资料的剪辑。他们之中不乏我的师辈或领导,有的是好友。梁谷音、张洵澎、蔡瑶铣等,则是我看着她们长大成名成家的,她们都习惯称我“蒋伯伯”。

至于胡适,在此书中占六篇之多,却没有写我和他的交往。其实,我和他也是相当熟悉的,彼此曾无拘束地多次畅谈。在建国之前,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我在“文革”中挨过大小批斗无其数,其中也包括我和他的所谓“关系”问题。后来去徐家汇藏书楼多次,想找出我当年“吹捧”他的文章,希望由此而能记得完整一些,却始终未能找到,所以就没有写,将来还是要写的。

最后几篇文章较多的是谈自己,比较详细地谈到了《武训传》批判、《李世民与魏征》问世经过和《海瑞罢官》事件。这些陈年老帐多谈实在也厌倦,但是坊间出版的有关书刊虽多,某些情节仍有不少含糊之处。尤其是《文汇报》关于《海瑞罢官》两次座谈会的经过,外界基本上没有弄清。那几本张春桥的传记中也

欠清楚,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有责任作认真的回忆。因为除周谷城老先生之外,参加那两次会的周予同、谭其骧、李平心、李俊民、陈向平等大都早已谢世了。所以我为《新闻记者》写了那篇回忆文章。后来《文汇报》报史室的同志反而也寻找我这篇文章作为主要参考材料了。

编辑这个集子,把文章重新阅读一遍,半个世纪以来的经历又先后重温了一次,陈望道、孙伏园、赵景深、马少波诸位师友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我仍永志不忘。

怀念黄芝冈先生的文章发表后,黄老的女儿从故乡湖南寄来了一封信,情真意切,对我表示感激。她和我一样,希望有关方面能将黄老的遗著辑集出版,以慰在天之灵。但也和我一样,希望总是以失望告终。

此书所收文章均已在报刊上发表过,而在《世纪》、《书城杂志》发表者尤多,此外,在业已于两年前停刊的《艺术界》发表的也不少。这个品位颇高,在国际上也甚有影响的刊物终于因经费而夭折,令人感喟不已。发表在《文汇报》、《人民政协报》、《澳门日报》以及《新闻记者》、《上海滩》、《上海戏剧》等处的也各有数篇。对以上各报刊主编、编辑,我在此表示谢意。

目 录

自序·····	1
与陈望道的往来·····	1
陈望道的两本书·····	6
胡适在中国公学·····	9
胡适与傅斯年·····	17
胡适对京剧的态度有三变·····	25
胡适对张学良的成见·····	33
胡适不听陈垣的逆耳之言·····	36
胡适与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39
我的良师孙伏园·····	41
黄芝冈的刚正与固执·····	44
任二北的学风·····	50
谭正璧和他的戏曲史著作·····	55
赵景深二三事·····	60
深切怀念赵景深·····	67
张若谷与《马相伯年谱》·····	72
关于顾仲彝·····	74
我与王季思的交往·····	77
关于吴晗给我的信·····	83
编辑家李俊民·····	88

2 书友文丛·文坛艺林见知录

王进珊与《申报》文艺副刊	91
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	96
痛悼吴强	102
记吴晓铃	107
唐弢与鲁迅之间	113
在我记忆中的唐弢	118
海外红学大师周策纵	121
马少波与马欣来	129
台湾戏曲家魏子云	134
同乡菡子	141
忆祝肇年	144
曾永义与台湾戏曲	148
葛晓音讲唐诗驰誉美国	152
葛晓音的“苦斗”历程	156
东瀛女学者冈崎由美	162
我所知道的周信芳	165
麒派传人安在哉	173
周信芳主演的三部电影	177
忆昆剧泰斗俞振飞	180
“棚友”黄佐临轶事	185
傅全香梦圆《人比黄花瘦》	193
梁谷音淡化了潘金莲的性感	198
张洵澎和她的老蔡小蔡	203
北昆蔡及其艺术风格	208
嫁给了京剧的郭小庄	211
口技大师孙泰的奇遇	217
程十发和他的画	220

陪程十发“拉洋片”记·····	225
戴敦邦及其人物画·····	228
为戴敦邦造型·····	235
王大进的人物雕塑·····	239
高桥亚弥子的《镜采伶影》展览·····	245
忆华东文化部的作家、艺术家·····	249
我和《大公报》·····	255
海瑞魏征和我的冤案·····	262
关于《海瑞罢官》的两次座谈会·····	271

与陈望道的往来

1939年,我考进了设在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的复旦大学。老师大都是原来在江湾执教的,没有能内迁的,就暂时在孤岛上开课了。

教大一国文的老师是汪馥泉教授,译过好些日文的文艺理论书,除了教我们读些古文或五四以来的散文之外,同时还教修辞学,课本就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我本来以为修辞学十分枯燥乏味,兴趣不浓。后来觉得书中所举的例子很生动,汪馥泉教授的讲课娓娓动听,并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所以这门课,我读得很认真。

但我心里有一个哑谜,当时实在解不开。我初以为陈望道先生是一位思想十分激进的进步文化人,为什么竟能安下心来做这种寻章摘句的琐碎工作呢?到我把这本书读完,才稍有领悟。后来在北碚夏坝,在黄桷树下,多次亲聆教诲之后,才完全明白。陈望道先生始终认为语文现象是社会现象,所以异常重视,才花了艰苦的劳动完成了这部奠定中国当代修辞学基石的力作。

在赫德路复旦大学,教授和同学只有上课时才见面,地处孤岛,敌伪的魔爪随时会出现,所以大家彼此很少交往。汪馥泉教授有时也偶然提到陈望道先生,我们知道他俩是老朋友,别的自然未便多问。我以为陈望道先生在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实际

上当时他在上海,因环境恶劣,所以不公开露面,后来才去北碚夏坝的。

我对《修辞学发凡》的兴趣日趋浓烈了,感觉到书中所举的例子似乎还可以丰富,于是从良友图书公司所出版的《短篇佳作集》中又选了许多例子,记得端木蕻良的《鹭鹭湖的忧郁》等小说我都选了。而且辗转托人,把这些例子都用中文打字机打好,准备将来面交陈望道先生,供他选用。

孤岛形势在日趋恶化。我于1940年年底取道香港到了内地,行色匆匆,却把那叠修辞例证忘记带去。等到我确知陈先生已经在北碚,才又设法托人从上海带到重庆。大概是1942年,我奔波跋涉了一天,到北碚夏坝,寻到了陈先生,面交了这一叠例证。就这样,连介绍信也没有一封,陈先生却十分亲切地接待了我。听我介绍上汪馥泉教授的修辞学的情况,他不时点头微笑。

对我的劳动,他表示感谢。他说一定很仔细地看这份材料,肯定是有用处的。就这样,后来也通过多次信。1944年秋天,我从重庆南郊移居北温泉,到夏坝路近得很,在嘉陵江上坐一小时的划子(小船)就行了。回北温泉是逆水,时间要多一倍。我差不多每隔两三个月就去看他一次。¹

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翻译者,他也没有主动提起过。我们仍旧以谈修辞学为主。他比较强调修辞在文字、语言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性是等同的,写文章不注意修辞固然是欠缺,说话时不注意修辞,就容易使对方误解,或者听过以后就淡漠了,记不住。因此,不写文章的人,甚至不动笔的人也要学点修辞。这些讲法,使我豁然开朗,得益匪浅。

关于我搜集的修辞的例证,他说已经看过,对研究很有用。但《修辞学发凡》一书现在不重印,即使印,例子也不一定补充进

去。因为作为教材,例子已经多了一些。而且举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作品较妥,有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虽然很有水平,但读者还不是太熟悉,作了例证就不太理想。

当时,他在复旦大学任新闻系主任。通过多次交谈,他认为我在收集资料、整理资料以及编制目录、索引等检索程序方面有些经验和见解,希望我为新闻系的同学做一次《资料学》的专题讲座。但一来我没有什么独到的经验和见解,二来我才二十四岁,不敢上大学讲台,坚决辞谢了。忠厚长者的陈望道并没有因此而生我的气,对我一如既往。

我知道陈先生编《太白》杂志的时候,鲁迅为《太白》写了很多杂文,是主要的支持者和作者,而且对于胡适和林语堂,鲁迅都是抱批判态度的,陈望道先生也抱着类似的批判态度。我好奇地提到这个问题,他并没有作什么说明,而是很严肃地谈到了冯雪峰。他对冯雪峰的评价相当高,而且认为冯雪峰有一个时期的确和鲁迅十分接近,他们之间有非常深厚的友谊。说到此处,他感慨系之,对我说:“这些事情,恐怕只有文艺界略知一二,外界是不会知道的,可我很清楚。”他估计将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会有公正而客观的记载的。

事实的确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建国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书刊,都有翔实的历史记录了。

虽然那时候,大专院校的系主任会议不是太多,但我总深怕妨碍他的工作,所以到了1945年夏天,放了暑假才到他家中去拜访、请教,没想到更增加了他的麻烦。每次我一进门,他总是——面招呼我在较风凉的地方坐下,一面就亲自去捧一个大西瓜来剖给我吃,而且一定要我吃半只。我说北温泉山上也有西瓜,天天都吃的。他说:“天热,走这么远的路,出了一身大汗,不吃西瓜怎么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一片欢腾,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第二天,我带着欢腾的激情去看陈望道先生,他当然也很高兴、激动。但是比我预料的情景要平静得多。我觉得很奇怪,又不敢问他。幸好他等我坐定以后,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日本投降是时间问题,迟早总要投降的。如今投降了,当然很好,我们自己呢?胜利之后,会不会较快地出现一个进步而统一的中国呢?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看呢?形势将会如何发展呢?”

我毫无思想准备,就老老实实回答道:“我还没有想过啊!”他说道:“不只你一个人,恐怕很多人都像你一样,还都没有想过呢!”

这是我和陈望道先生单独的最后一次毫无拘束的漫谈。在归途中,既感到这位忠厚长者的可敬可爱,也想起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所说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正是在陈望道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么!?

人事倥偬,一别就是五年。这五年之间,他的行踪、工作,我虽不太详细,还是知道一些的。

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文化部,陈望道先生出任部长,我在艺术处工作,这才又有了见面的机会。

陈先生的主要职务是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华东文化部只是每星期来一两次,文化部的日常事务都是由黄源副部长处理的。

从江湾到衡山路,往返就要花许多时间,所以在华东文化部坐定下来的空闲几乎是没有的。好在在部长办公室担任机要秘书的姓程的女同志也是复旦毕业生,她很理解我对陈望道先生的敬仰心情,只要陈先生有片刻空闲,她就及时通知我,我就见缝插针去部长室坐一坐,问问他的健康情况,谈谈巴山夜雨等旧

话。

他是部长,我是一个具体工作人员,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指示或直接布置的工作,唯一的例外是周信芳演剧生涯四十年的纪念。纪念刊要他写文章,他对我说了一个大意,我起草了一篇极短的短文,最后经他修正后定稿发排。文章之所以短,倒不是他讲得太少,而是我担心写出来的东西在文法上、修辞上可能经不起他这位行家的推敲,所以不敢写长。他真是忠厚长者,并没有提出什么批评。

华东文化部的撤消,使我们又失去了见面的机会。

要感谢无所不能的造物主,1960年当我被调到《辞海》去参加修订工作时,巧得很,陈望道先生被任为主编。当时他虽然不像罗竹风、杭苇两位那样经常住在浦江饭店,却也是经常来的,我再一次得到了聆受教益的机会。

1964年,《辞海》修订本正式出版,封面的《辞海》二字的题签就是陈望道先生的亲笔,对我来说,又增加了一分亲切之感。

陈望道先生对妇女运动、对反文化围剿、对中国教育、对文学艺术、对整个马列主义的革命运动都有他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和陈望道先生接触的时间并不太长,有所请教也以修辞学为主,所以这篇文章只是写了回忆中的一鳞半爪,不能较全面地反映出陈望道先生的革命精神和学术成就。但我还是写了,主要是表达了我的崇敬心情和深深的怀念而已。

陈望道先生1890年12月9日生于浙江义乌,1977年10月29日以87岁高龄病逝于上海。谨以此文纪念他的诞辰一百周年。

陈望道的两本书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诞生 100 周年,我想谈一下他在语言文字学之外的一项重大贡献。他早年在日本留学四年,先后攻读了文学、哲学、法律、数学、物理等学科,所以学识十分渊博,更难得的是他在课外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认真的钻研。

五四运动发生了,陈望道先生乃从日本归国,投身于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聘请他担任语文教员,他于 1919 年 6 月到任。他的进步言行,遭到了统治阶级的迫害,并被加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学校师生则纷纷声援。由于环境过于恶劣,他遂于年底回到故乡,金华附近的义乌县分水塘村。在这山明水秀的环境中安下心来,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钻研。那时候这些书籍还没有中文译本,他兼通英文、日文,所以可以同时阅读这两种文字的不同译本,相互参照而更能把握其确切涵义。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之下,他以英文本为主,以日文本加以参校,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中文译本。

第二年春天,陈独秀邀请他来上海做《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筹建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了这一部《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从 1920 年到 1927 年,印行过好多版本,从此,广大进步人士才

逐渐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反动统治者本来就因浙江第一师范学潮这件事而对他很仇视,他又译了反动统治者像对洪水猛兽般害怕的《共产党宣言》,就成了他们造谣诬蔑的主要对象了,编造许多无中生有的所谓“新闻”,每次都在姓名之上加一顶“《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帽子。例如《社会新闻》,就在陈望道即将去安徽大学教“普罗文学”之时,刊出了“《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大计划……已于……上任矣”的消息,又把这份报纸分别寄给了校长、文学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企图阻挠。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又制造别的谣言,或派人到课堂暗中监视,或在马路上背后跟踪。

可贵的是,陈望道先生从来不自诩在这方面的贡献。建国以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的《共产党宣言》在翻译和校注方面工作做得更为完善,发行量也大。但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史研究者仍牢记陈望道先生当年的不朽功绩。周总理就向陈望道先生询问过当时的翻译情况,并相互讨论了一些翻译上的问题。

* * *

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一书出版之前,已经有过唐钺、王易诸人的近十部修辞的书籍出版,但是都不太系统化,有的专门用古文作为例证,有的则类似西方修辞书籍的翻译,不能解决、不能说明语言上的、文学上的许多具体问题。刘大白为《修辞学发凡》写序,认为此书与马建忠的研究文法的《马氏文通》具有同样高的学术价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部学术著作之所以成为当代修辞学的奠基石,首先要归功于他始终把语文现象看成为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所以不仅重视文字,而且也重视口语。不言而喻,修辞不仅仅是文